

论邛窑对唐代成都经济的影响

范仲远

(四川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 四川成都 610068)

摘要:成都以西约六十公里处的邛崃古窑遗址,以“开中国彩瓷之先河”的历史地位,揭开了中国陶瓷从崇尚自然、效法自然,向绚丽多姿、五彩缤纷的彩瓷方向发展的美丽篇章,为中国古陶瓷业的发展描上了辉煌的一笔,也为唐代成都的经济兴盛带来了繁荣。通过邛窑就唐代成都陶瓷经济发展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揭示历史上成都被称为“扬一益二”经济繁荣的重要成因。

关键词:唐代;邛窑;成都;陶瓷经济圈

中图分类号:F127.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5)04-0138-04

成都在唐代称为益州,是唐代经济繁荣的重要地区,与当时经济重镇扬州一道被称为“扬一益二”。唐代的扬州是我国著名的水陆交通枢纽和商业贸易中心,以蚕桑经济为核心的丝绸贸易倍受人们欢迎,畅销国内外,航运业、盐业、小手工业等也十分发达,造就了唐代的扬州经济在全国居第一的地位,成都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已居第二的重要位置。也正因为唐代成都经济的兴盛繁荣,吸引了当时众多的文人骚客入川,引来唐宋时期文化在成都的高度发达。唐代成都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商业和交通也随着发展起来。蜀锦、蜀纸、蜀麻在外销经济中也非常活跃,漆器、制扇、酿造、冶铁、雕版印刷等行业的发展在成都经济繁荣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陶瓷经济在唐代成都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作用。陶瓷手工业无疑是成都当时的核心工业,应该说成都在唐代如果没有陶瓷经济,就没有成都在全国经济中“扬一益二”的地位。

唐代成都陶瓷经济圈,包括了成都及成都周边地区的郊县。由陶瓷手工业为主的共同体,拥有众多的古窑场,如邛崃境内的邛窑,成都的青羊窑、琉

璃窑,郫县的横山子窑群,金堂的金锁桥窑,双流的牧马山窑,灌县金马六马槽窑、玉堂窑,乐山金凤窑、关庙窑,新津的白云寺窑等,以及还有许多没被发现和已经消失了的唐代窑场,如“扣如哀玉”、白“如霜雪”的大邑古窑、蒲江金马寺“窑坪”古窑等,它们都应是成都陶瓷经济圈的重要组成,其中又以邛窑为代表。当时成都及成都周边地区窑场四起,窑包林立,仅以邛窑和琉璃窑为例:丁祖春在《四川邛崃十方堂古窑》文中叙述道:“邛崃境内的邛窑由十方堂、尖山子、瓦窑山、西河乡才冲土耙桥、固驿镇等古窑场遗址组成。仅十方堂窑遗址现存窑包13座,最高的约10米,低的约4米。在窑包的顶部还可以见到红烧土。”[1](120页)琉璃厂古窑位于成都外东偏南的琉璃乡,据丁祖春《成都胜利公社琉璃厂古窑》记叙:“五十年代,散布在地面的陶瓷碎片和各种破窑具,面积达三百四十多亩,堆积层厚1—3米,突出地表的窑包二十一堆。据当地农民反映,传说琉璃厂极盛时有窑九十九座。”[1](171页)

人们普遍认为,古代成都四周的所有窑口生产的陶瓷,都只是为当地人提供当时日常用品的地方小窑。但我们从下面材料的分析中发现,这个观点

收稿日期:2004-11-15

作者简介:范仲远(1952—),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助理研究员。

有些问题。据谢元鲁《论“扬一益二”》文中介绍：唐前期的贞观十三年，益州人口为11万7千余户，唐中期的天宝元年为16万余户，唐晚期的元和时人口为4万6千余户[2](102页)，而唐代成都地区的窑口，大多为龙窑，灌县玉堂古窑有42米多长的龙窑。丁祖春在《从四川唐宋古瓷窑炉看南北科技交流》一文谈到灌县玉堂古窑时称：“据有关方面计算，42米长的龙窑一窑可烧瓷器一万五千件以上”[1](59页)。我们可以推算：一口窑一月要烧多少？一年又要烧多少？成都陶瓷经济圈内众多的窑口，一年又要生产多少？十年、百年又要生产多少瓷器？显然这些众多的窑口不只是为了满足成都当地人自身对陶瓷的需要，明显具有满足当地经济发展需求的目的。

1975年，在扬州西门外唐代遗址中，发掘出作为商品运来的邛窑瓷片，这从事实上证实了当时成都陶瓷经济的存在。傅振伦《四川古代的陶瓷器用》文中引唐赵元一《奉天录》记载：“太史奏曰：窑门出天子，有诏去城七里内诸窑尽废之。”当时相传“蜀主都门附近，窑门甚多”[1](20页)。从这里我们看到，在唐赵元一生活的时代，成都“蜀主都门附近”，就存在许多的“窑门”。杜甫也留下“大邑陶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孀雪，急送茅斋也可怜”的诗篇[1](102页)。从遗址的存在，到作为商品实物“瓷片”的实物证明，以及历史文献的佐证，都说明了唐代成都陶瓷经济的发达是客观存在的。

唐代成都陶瓷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与唐代政治、军事制度建立实施是分不开的。“节度使”制使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远离政治中心的“蜀王”，为巩固边防，发展经济，自设“窑门”。这在全国各省经济发展中，获特殊经济发展权之利。这很可能是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默许，这也很可能是成都陶瓷经济发展不见经传的重要原因。成都因“政令不畅”而导致“蜀主都门附近，窑门甚多”的说法，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因为成都如果是“政令不畅”的地区，唐玄宗避“安史之乱”时选择成都，统治集团不能不考虑其安全因素而选择它处；诸多大文豪入川后的著述中，不会没有记录成都当时“政令不畅”的只言片语。种种迹象表明成都陶瓷经济，应该是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唐代成都经济的发达也对全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带来了成都文化的发展，形成当时成都与外界

文化交流的历史高峰。

唐代瓷艺南青北白，唐代成都陶瓷经济圈中仍以青瓷为主，邛窑、青羊窑、白云寺窑、牧马山窑、横山子窑群、金锁桥窑、玉堂窑、关庙窑等窑场，其占地和生产规模在唐代是空前的。众多古窑场中又以邛窑为其代表，兴盛贯穿全唐。生产青瓷，这是运用当地材料的优势，具有地区特点的产品。“唐代青瓷仍居重要地位……四川成都青羊窑和邛窑等是当时的主要产地”[3](22页)。唐代成都陶瓷手工业空前发达，国内同期任何地区的陶瓷生产无论是规模、数量都无法与之抗衡。唐代成都繁荣的贸易经济和发达便捷的水上交通，将陶瓷产品通过南河与府河等水系进入长江，远销全国，它们对陶瓷经济圈和“益二”的经济繁荣地位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在唐代，成都应是当时的陶都。

瓷器的产生和实用性，自然代替了造价昂贵的青铜器皿。虽然它要粗糙一点，但也不是当时任何人都能使用得起。万州晋代附马墓出土了一组冥器——青釉人马俑，其制作水平与邛窑系的青釉产品应在相近似的技术水平上（但它的温度达不到邛窑的火候）。从墓主的身份分析，附马应该算作皇室成员，它的殉葬品陶瓷人马俑，应该是当时的高水平了。但质地也却如同邛窑的青瓷，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青铜器制品逐渐退出贵族生活后，取而代之的瓷器在往后的百年后进入隋唐，其瓷器质量的提高是有限的。这些产品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的确有点粗糙和简单，但放在1300多年前的隋唐时期，这应该是算作“精美”。据陈丽琼在《试谈四川古代瓷器的发展及工艺》文中谈到：“据记载：唐末前蜀王建，报诸梁信物，有金棱碗。致语云：‘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报青瓷之响。’可见王建贡物的瓷器是秘色青瓷碗，其口沿镶嵌有金、银边。”文中又谈到：“这类秘色瓷，在重庆博物馆藏有一器，从工艺特点上看属成都青羊宫窑烧造。”[1](72页)在王建墓出土的珍品中有相当数量的邛窑瓷器。邛窑产品在隋唐墓圻中多有出土，当时能建起精美墓圻的墓主，应是有相当实力的人物。按照当时的封建墓葬制度，决不允许有不符合他们身份的葬器出现在他们的圻室中。就连《景德镇陶录》也认为蜀窑器“体薄而坚致，色白声清，为当时所珍重”[5]。

邛窑产品质量具有火候高、釉色美、器型小、胎质较粗的特点，多为日用品。邛窑瓷的胎多呈灰、灰

白、褐、褐红或砖红色,以灰、褐为主,有微小气泡,质地不很坚密,胎体上有的上一层白色或褐色护胎釉,有的不上护胎釉,但只是少数,这是邛窑系青瓷窑胎体的共同特点。

邛窑的产生发展也有过漫长的前期过程。四川古陶在远古时就已产生。成都的宝墩文化、广汉三星堆月亮湾文化堆积层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四五千年前的陶器碎片;理县杂古脑地区3千多年前的文化堆积层中,发现以灰陶和黑陶为主的陶器碎片。威州彩陶更是反映了当时临近邛崃古窑遗址的藏羌地区的文化繁荣景象。成都的青羊古窑、灌县金马六马槽古窑址最初产生的时间都早于邛窑,可以追溯到汉代,它们对邛窑的影响显而易见。丁祖春在《四川邛崃十方堂古窑》文中谈到:“冯先铭同志认为,邛窑的上限可能早到南北朝,这种推测是比较切合实际的。”[1](124页)它们无论从原料生产到工艺制作都表现出与邛窑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这些古窑的陶瓷有何特点,邛窑最终是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成都古陶瓷缺少生命力,难以放射出耀眼的光辉。

在正式发掘的青羊宫窑中,中医学院工地位于西一环路二段东侧,一号窑。窑内出土器物有I、V式碗,I式杯,I、II、III式盘,VI式盘口壶,I、II式钵,I式蹄足砚和印花碟等青瓷器,并且还出土有北周“布泉”钱文陶瓮残片和I式复式双系陶罐等。一号窑的窑物对照隋墓器物,其中V式直口平唇弧腹假圈足碗的造型与四川新津普兴乡十村开皇元年隋墓出土的碗相似。I式敛口弧腹假圈足青瓷杯的造型与湖南湘阴县大业六年隋墓中出土的青瓷杯完全相同。II式高足盘与长沙隋墓中出土的高足杯也相似。I式碗的造型与四川中江县、昭化宝轮院南朝墓中出土圜口深腹假圈足碗相似。I式碗的造型与四川中江县、昭化宝轮院南朝墓中出土的直口深腹假圈足碗相似。I式双耳陶罐造型与安徽鞠湖南朝墓出土的双耳青瓷罐相似。在七、八号探方中,在三号窑中出III式杯与长沙武德年间唐墓出土的杯相似。而VII式、IV式莲花纹瓦当又与西安唐兴庆宫遗址、云南唐代南诏国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纹饰相同,在三号窑头退灰坑内还出土了内藏有开元通宝的III式罐。三号窑定为唐窑[6](113页)。仅从唐代成都陶瓷经济圈规模和影响,都不算太大的青羊宫窑的正式发掘报告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成都

陶瓷经济圈对全国经济影响之一斑。

在对外文化交往中,早在汉代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就与西亚、南亚各国友好交往。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境外看见“邛杖、蜀布”。美籍学者葛维汉著《邛崃陶器》记载“在大英博物馆中藏有底格里斯河附近沙马拉和勃罗明巴德遗址‘原位’出土的中国陶器。这些属于公元800—900年的瓷片与邛窑出土遗物极为相似”[1](108页)。陈显双、尚崇伟在《邛窑古陶瓷简论——考古发掘简报》中介绍邛窑陶瓷中出现有“头戴鸟头瓜瓣式高冠,身着紧袖落地长服,腰束带,脚登靴,浓眉大眼高鼻”的胡俑[7](208页)。陈丽琼在《邛窑新探》文中又谈到:“唐三彩人物水丞,器为一体态丰腴、深目高鼻的少妇,身着折领短袖衣,怀抱一角杯(杯空可盛水),面容肥美,颇有唐代胡人装扮。”“人物造型戴胡帽,高鼻深目,下颌突出,五官朦胧,手法凝练,简洁明快。俑头为黄褐色胎,米黄色釉下着绿褐彩,莹润可爱”。陈丽琼又在《邛窑古陶瓷发展概述》记叙:“还有头戴尖顶帽深目宽鼻翼满脸须髯,面带笑容,身着折领衣,腰系带,双手贴于胸腰站立的胡人,以及怀抱角杯的男、女胡人形象,皆塑造得有血有肉,充分表现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气质的人物形象。”[7](109页)可见邛窑产品并不仅仅是为当地地方日用而生产陶瓷用品。

邛窑青瓷是美丽的,邛窑三彩更成就了中国瓷器的辉煌。邛窑三彩以兼工带写,有各种图案的国画效果,是“绘三彩”。它的彩绘方式与北方三彩以平涂釉料为装饰有所不同,在陶瓷彩绘史上是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的。邛窑的三彩有时在化妆土上绘彩后,再上一层透明釉;有时则在乳白釉上彩绘。1999年本人曾到茂县、汶川、理县等地进行考察,曾在汶川老乡家中看见了三具数寸长的陶瓷弹琴与说听彩俑。酥松的深红陶胎俑上,全身施满了清白釉,在釉上面用红、白、黑矿物颜料为彩,以白色为主色调,陶俑周身作满彩绘,笔者认为这应是邛窑系所生产烧制的东汉青白彩釉俑。这是否中国彩瓷的滥觞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这与后来邛窑陶瓷装饰——邛窑彩绘形成与“邛三彩”的成果发展是分不开的,也为后来陶瓷釉上彩和釉下彩的两大装饰派别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借鉴。“邛三彩”与北方当时的“唐三彩”比较,“唐三彩”为低温彩,不易长期保持;“邛三彩”由于经过 $1200^{\circ}\text{C} \pm 20^{\circ}\text{C}$ 的温度烧制,这已经接

近成瓷温度了。在技术上保证了保持彩色的鲜艳和长期性的效果,烧成技术显然比北方“唐三彩”高一筹。

邛窑产品品种繁多,造型优美。各种造型和纹样的多变,更受人们的喜爱。其产品有生活日常用品,如碗、盘、杯、碟、盏、灯、水丞、粉盒、枕、罐、壶、瓶、钵、炉等,瓷塑陈设品有鱼、龟、鸡、鸭、兔、狗、猪、羊、虎、狮、猴、龙、象等,玩具有响铃、瓷珠、口哨、小妇人和各式骑马小人物,另外也有单人女舞俑、人骑异兽、佛像、多种兽瓷枕等。文房用具有各种兽形镇纸,水丞有老人抱角、武士抱鱼、胡妇抱角等。邛窑冥器杯型长明灯中的小鸟刹也颇为古朴、可爱。邛窑产品造型最具特色的是提梁杯和省油灯。

邛窑产品在纹饰上有刻花、印花、划花和绘画等,以绘画为多,印花和刻花次之。划花多在早期器物上。南北朝、隋代多以刻、划莲瓣纹装饰碗、盘、罐、壶的外壁。唐代器物多在外壁印花,印以褐、绿色釉的圈点,串成方圆或棱形等图案纹。宋代的印花在碗、盘、盏、杯、碟、盒盖的内壁和内底,印龙凤、花鸟、虫草、荷叶等纹饰。出土的印模做工精细,纹饰精美。

当中国古陶瓷进入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宋代时,陶瓷产品无论是胎质的纯净、造型的丰富还是涂釉的精美,直到今天仍令人赞叹不已。汝、官、哥、定、均等名窑兴起,其产品更受人青睐与喜爱。罗希成《唐邛窑奇品》载“其釉色有如均窑者,有如汝窑者,有如龙泉大观绿等者,亦有三彩者,色白固无论

矣。亦可谓宋代之均汝窑之釉色,均胎息邛窑而来。”[1](96页)又据魏尧西《邛窑》一文载,“《蜀胡别录》云:邛窑影响宋瓷甚巨,均汝诸器,可为侧证,论瓷者不可不知”。又“均以邛窑之釉水,实开宋代均汝诸窑之先河”[1](118页)。邛窑对宋瓷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久盛必衰,衰久必败。名窑的兴起,邛窑停烧的命运再所难免,宋以后邛窑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占据数百年,仍有几分粗糙的、以邛窑为代表的邛窑系陶瓷退出历史舞台已是必然的,落后必然被进步代替。成都陶瓷经济圈的产生、发展与衰落,仍不可避免这一经济发展规律。邛窑没有以成都陶瓷经济作为依托,它也不可能独领风骚;成都陶瓷经济没有邛窑作为灵魂,就难以形成成都陶瓷经济圈。邛窑在唐代以成都为商贸中心形成的陶瓷经济圈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也为后来宋代成都商业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成都陶瓷经济的衰落,宣告了邛窑系陶瓷时代的结束。但是邛窑及邛窑系为中国陶瓷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完成,存在许多先决条件。成都在唐代如果没有“窑门出天子”的限制,如果不是因为成都远离中央,如果没有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蜀主都门附近,窑门甚多”的现象是不会出现的,成都陶瓷经济圈也就不会形成。唐代成都陶瓷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很大程度反映了唐代成都在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参考文献:

- [1] 四川古陶瓷研究:第一辑[Z].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 [2] 唐史论丛:第三辑[Z].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 [3] 陆建初. 古陶瓷识鉴讲义[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4] (清)许瑛. 陶说[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影印出版,
- [5] 四川古陶瓷研究:第二辑[Z].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 [6] 耿宝昌. 邛窑古陶瓷研究[J].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
- [7] 文物参考资料[J]. 1956,(6).

[责任编辑:李大明]